



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兜售繁荣

Paul Krugman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 保罗·克鲁格曼◎著

刘波◎译





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Paul Krugman

兜售繁荣

[美] 保罗·克鲁格曼◎著 刘波◎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兜售繁荣 / (美) 克鲁格曼著 ; 刘波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2.10

书名原文 : 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ISBN 978-7-5086-3426-5

I. 兜… II. ① 克… ② 刘… III. 经济 - 研究 - 美国 IV. F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5882 号

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by Paul R. Krugman

Copyright © 1994 by Paul R. Krug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兜售繁荣

著 者 : [美] 保罗 · 克鲁格曼

译 者 : 刘 波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0.25 字 数 : 225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09-3068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3426-5 / F · 2707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一位印度籍经济学家曾在研究生经济学课堂上讲解他的转世轮回理论。他说：“如果你是善良高尚的经济学家，你下辈子就会成为物理学家；如果你是邪恶奸猾的经济学家，你下辈子就会成为社会学家。”

一位社会学家也许会说，这段话表明了经济学家的思维误区：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一门人文学科，而经济学家却希望它能拥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高度精确性。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经济学刊物中充斥着数学计算，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用数学的外衣包装平庸的思想。但优秀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段话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层意思：经济学是很难的，它比物理学要难，不过幸运的是，它并不像社会学那么难。

经济学为什么这么难呢？复杂性是原因之一。我们不能把经济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来研

究。物理学很能解释那些简单的、有一定规律的系统，如围绕太阳运行的恒星、在氢原子的轨道之间跳跃的电子等。但在面对一些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时，物理学的解释力就要差多了。例如，虽然我们花了大笔资金来研发卫星和巨型计算机，但天气预报还是经常出错。如果你邀请那些研究气候变化规律的人作一些推测，如推测全球变暖的前景，他们会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还会展开激烈的辩论，就像当你向经济预测师询问某项经济政策的影响时，他们也会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一样。

经济学之所以难的第二个原因恰好就应了上面那位社会学家的批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而人的行为不是简单、机械的。举个例子，经济学家对恶性通货膨胀有很深的认识，恶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每个月上涨 50% 以上，是一种极度的货币失衡现象。事实上我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学家对恶性通货膨胀的认识程度，大致相当于气象学家在能够利用巨型计算机设计飓风模型之前对飓风的认识程度。在那个时候，气象学家虽然难以作出精确的预测，但他们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飓风的原理和基本的等级。但是，今天的飓风与 1 000 年前的飓风并无不同，恶性通货膨胀却是全新的现象，因为只是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之后，恶性通货膨胀才得以发生；而且每次恶性通货膨胀都会具备一些新的特征，其原因之一是各国政府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但不一定是正确的教训）。

不过，尽管有这些困难，今天的经济学理论还是比较完备的，至少要比其他社会科学完备，这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最简单的行为（不过也许是最没有道德寓意的行为）。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总是纷繁复杂的，但市场交换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服从于一定的逻辑规律。每次出售都对应一次购买，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道理，却蕴含着一整套会计原理，其中的一些直到今天还能让许多人大感惊奇（例如，吸引一定外资流入的国家必然会有贸易逆差）。人们很少错过明显的获利机会，这也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道理，但我们可以从中引申出一些惊人的结论，例如股

价的“随机漫步”理论。

因为与其他社会交往相比，产品与服务交易是一种较为简单、人性色彩较淡的行为，所以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经济学理论更容易构建和验证。如果经济学是一门像天文学那样纯粹的学问，它应当会成为一门默默发展的学科，在过去的 200 年里，稳步地积累知识。

但经济学不是天文学，因为经济学结论对政府政策有直接的影响，而政府政策几乎会影响所有人。鉴于经济学是如此重要，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就会有许多人极为关注经济学，从而仔细地研究经济学。不幸的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不完美，所以人们只不过想用经济学来印证自己的设想，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兴趣。

当然，学术政治化并不是经济学独有的现象，甚至不限于社会科学。例如，神创论者不愿相信进化论，在达尔文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仍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还有不少人不愿相信艾滋病是由 HIV 病毒造成的，其人数之多令人担忧。不过，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成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抗生素的确能拯救病人、原子弹确实会爆炸，而且这些学科的研究工具都很精确，所以在这些领域，严肃的理论和伪科学之间通常有清楚的界线。

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条界线可就远不是那么清晰了。原因之一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进行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受控实验”，因为社会科学的证据必定是历史证据，而历史是很复杂的，历史经验通常都是可以作多种解读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由于我们人类总是有些刚愎自用，所以我们总是会在研究之前预设结论。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虽然说经济学知识在历史上得到了持续的积累，但一些迎合公众偏见甚至毫无道理的学说仍会不断地获得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年代，那种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设计经济理论的做法，更会甚嚣尘上。像这样的理论，通常都不会有多少道理，却可以迎合那些没有耐

心进行严密思考的人。

从 1973 年开始的美国人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的年代，就是一个这样的年代。在之前的一本书里，我曾将其称为“期望减退的年代”。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在这个年代里经济理论与政治相互影响的故事。这个年代出现了几场重大的经济学争论。笼统地讲，在这个年代的第一个十年里，保守派对政府干预主义发起了一轮强有力的挑战；在那之后，政府干预主义以一种更为成熟的形式复兴。这也是一个“政策企业家”叱咤风云的年代。“政策企业家”是指那些一味迎合政治家喜好的经济学家。在此期间，一小群所谓的“供应学派”学者宣扬着一种连保守派经济学家都视为无稽之谈的学说，竟然主宰了美国的经济政策，构成了这个光怪陆离的年代的一道奇景。在这个年代里，还出现了一群“战略贸易论者”，他们在自由派中的角色相当于“供应学派”在保守派中的角色，而他们现在依然控制着政坛。

我在动笔写作本书的时候，是想写一本基本上为自由派申言的论著。在那个时候，保守派依然占据着白宫，而我是个自由派，也就是说，我支持向富人征税，并用税收来帮助穷人与不幸者。在那个时候，我对一些人的做法感到气愤，他们用拙劣的经济学理论和虚假的经济成绩来为一种“劫贫济富”的经济政策辩护，那种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毫无益处。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修改了本书的结构。原因之一是，民主党人赢得了 1992 年大选，在这个时候，我再来写一本纯粹批判保守主义经济学的书似乎有点过时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努力思考美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学争论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严肃的经济学思想与庸俗的经济学偏方之间的区别，真正的教授与“政策企业家”之间的区别，至少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区别同等重要。

虽然本书的目的是传达一定的观点，但它也是由一系列故事组成的，有些故事是关于经济学的，有些是关于经济学家的，我希望这是一些有趣

的故事。我不明白公共电视台为什么总是请一些让人昏昏欲睡的人来点评经济，不过请读者忘掉那种人，因为经济学也可以是激动人心的。比如说，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单个公司与家庭的理性行为可能会产生累积效应，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的悲剧，这一理论在我看来，就有一种令人恐惧的美感。又比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几位不入流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媒体朋友竟然能在美国发动一场供应学派革命，这段奇怪的历史虽然令人懊恼，却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希望，阅读本书至少能让一些读者相信，与那些“政策企业家”提出的轻率的口号相比，严肃的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不仅更能引导我们发现真相，而且会更有趣味。

魔力无常，时有时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经济就像汤姆·沃尔夫所说的，是一种“魔力经济”。当时的一些魔力效果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1972年左右，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人均消费等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翻了一番。但是，当时笼罩全国的极其强烈的富裕感和经济乐观情绪是不能用单纯的数字来表达的。当时的美国人的确在为许多事情担忧，如社会动荡、核战争威胁、环境问题，但他们想当然地认定经济将继续发展，并带来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但在1973年，魔力消失了。

当然，它并不是突然消失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敏锐的观察家便发现，有迹象显示战后的大发展年代要走到尽头了。今天，“事

后诸葛亮”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生产率这个推动生活水平提高的动力之源早在 1965 年便停滞不前了，但当时的公众过了很久才发现美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觉得美国经济不振似乎不过是由一些偶发的不幸事件导致的，例如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能源危机，以及 1974~1975 年的“滞胀”局面（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的结合）。直到 1978 年或 1979 年，公众才开始真正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深切不安。不过，在那之后，乐观情绪也不时爆发并令疑虑消散，比如 1984 年罗纳德·里根宣布“美国清晨”的到来就让美国人欢喜连天。

但是，年复一年，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连不断。1991 年美国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只比 1973 年高 5%，而且这还不过是用工作时间的延长换来的，大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低于 1973 年。在此期间，无论以什么指标来衡量，贫困率都上升了，儿童贫困率甚至已接近警戒线。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富人的收入锦上添花，但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那场严重衰退让富人也感到不寒而栗。

最终，民众心理在此期间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单纯的数字所不能反映的。虽然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令人失望，但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美国的人均财富仍大大高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甚至高于 1973 年。不过，由于大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期望，所以财富的增长并未改善人们的情绪。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迈克尔·哈林顿觉得他有必要写一本《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以提醒占人口多数的富人，美国仍有不少穷人。在今天，谁还需要这样的提醒？1972 年美国销量最好的非虚构类著作是查尔斯·赖克的《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该书的主题是，既然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美国文化便可以推陈出新，大放异彩。而在 1992 年，排在非虚构类和虚构类著作第一位的则分别是莱斯特·瑟罗的《世纪之争》(*Head to Head*)与迈克尔·克赖顿的《旭日追凶》(*Rising Sun*)，这两本书均与美国的经济困难有关。比尔·克林顿的顾问没花什么心思便想好了该年选战的主题词——“笨蛋，问题在经济”。

这句著名的标语悬挂于他在各地的竞选总部里。

魔力经济为何消失无踪？讨论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有成百上千，本书并不是其中之一，但我将在本书的一章中用部分篇幅介绍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在其他地方我也会不时谈到这个问题。但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给出了许多解释，但大多数解释，包括那些最流行的解释，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大错特错的。也许有一些不甚流行的解释反而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不愿自欺欺人的话，就必须承认，没有人能知道这些解释到底哪个是对的。

问题是，这个回答有点令人失望，尤其是那些政治家，他们要面对变得日益悲观和愤怒的选民，对这种不明确的答案就更不满意了。对他们而言，经济魔力为何消逝、如何恢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课题。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他们必须找到一个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但至少能让足够多的选民相信他们有能力挽救经济。

那么，魔术失灵的时候怎么办？很简单，另找一批魔术师呗。

本书要讲的就是这番寻找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本书要讲的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政治家如何寻找持特定理论的经济学家，进而将其理论包装起来用于政治目的；经济学家又如何一边提出特定的理论，一边努力将这些理论转化为政治力量。

细究起来，这个故事十分复杂，因为它涉及的理论有的很隐晦，有的不正确，有的既隐晦又不正确。对于隐晦的理论，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弄明白；对于不正确的理论，我们也需要花点时间弄明白它们错在哪里。虽然理论方面的探讨比较复杂，但本书有两个简单的主题。

一个主题是大家熟知的现象：意识形态潮流会周期性地左右摆动。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极为保守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领域的保守派理论）突然之间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证明了保守主义的兴起。但从学术的角度看，1980年其实是保守主义的最高潮。

此后，虽然共和党在 1984 年和 1988 年的两次选举中轻松地保住了执政地位，但在此期间，帮助其上台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在逐渐衰落，1992 年老布什的竞选失败也证明了保守主义的衰落。

不过，本书还有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但同样重要的主题：世上有两种“经济学家”，可以分别称为教授和“政策企业家”，不幸的是，政治家几乎总是更喜欢后一种“经济学家”。

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当代社会流传着一个说法：政治家只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奴仆。大众常常以为，政治家就像大白菜一样被华盛顿的游说者买来买去。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等观察家则认为，美国的政治过程只不过是忠实地代表了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即收入最高的 20% 的选民，他们才是真正左右局势的人。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政治家的行为只是反映了某些强大的选民群体的利益，因而基本不会受到学理的影响。

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一些问题上，美国是有一些利益集团，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有能力去争取。他们不关心相关的经济逻辑——在联邦土地上伐木的木材公司和享受进口配额保护的蔗糖种植农对产权理论和贸易理论并不感兴趣。但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重大的问题上，选民并不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于是，政治家就会想办法为选民界定他们的利益，而这反过来又对政治家自己有利。

历史上最成功的为公众界定利益的人，当属罗纳德·里根。他的竞选主题很明确：美国的中产阶级受到了过多的管制，税负过重，在“大政府”的重轭之下气喘吁吁。他描绘了一些很有煽动力的画面来说明这个主题：有的穷人靠福利收入买了凯迪拉克车，成为“福利女王”；成群的官僚挤

在巨大的办公室里，每个官僚专门照顾一个印第安人。但这些画面都是虚构的，谁也没见过开凯迪拉克车的“福利女王”，也没见过哪个印第安人得到专人照顾。而且，里根描绘的总画面也是很不符合实际的：美国人的税负并不高，而是发达国家里最低的，而且政府把大部分税收花在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大众福利项目上，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事实上，里根以一个颇能让人相信的神话为基础，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这个神话非常不符合事实。

罗纳德·里根的例子说明，要取得真正的政治成功，就不能只是迎合民众当前认识到的利益，而是要想办法改变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从而利用他们的怨气，引导他们支持一些政治家所能主导的政策变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保守派成功地创造了一幅虚假的图景（“大政府”、过重的税负），并声称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弊端。这幅图景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共鸣，从而使保守派得以长期掌权。聪明的自由派很早就明白了，虽然他们在运气好的情况下也能赢得选举，但要真正打破保守派的主宰地位，他们就必须描绘一幅新的图景，从而改变选民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也就是说，在总体上，政治的关键并不是利益之争，而是理论之争。

但经济学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经济学家那里来的。我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家”，是指那些时常就经济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一样的，事实上，经济学家包含两种差别极大的类型：教授与“政策企业家”。

教授

我这里说的“教授”是指学术型的经济学家。电视上介绍的那些“经济学家”并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人，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是这样的人。你早上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商情预测师，他们的工作就是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对未来几个月的商业形势作出明确的论断，而这样的

论断很少是对的（学术界将他们讲的东西蔑称为“涨涨跌跌经济学”）。你在晚间或周末的谈话节目中见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则大多数是“政策企业家”，学术界认定的重要或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几乎从不会出现在这样的节目里。例如，罗伯特·卢卡斯绝对是20世纪7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家，保罗·罗默可谓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家，但他们都没有在公共电视节目中出现过。

如果是这样，还关注他们干吗？如果学术型经济学家处于公众视野之外，他们还重要吗？教授的重要性当然没有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大，但他们的理论足以改变现实。单凭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考察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教授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就像企鹅或鸵鸟一样，总有一点点滑稽可笑的味道。在美国学术界，经济学教授一般会得到教职，并通过发表文章来获得声誉，从而获得更多学术上的好处。所以，经济学家通常会发表大量文章，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论文出现在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刊物上。这些论文大都不值得一读，而且有很多根本就没法读，因为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数学计算，外人看不懂的学术行话就更多了。

这么一来，经济学家写这些论文的动机就难免让人怀疑了。如果你是一名经济学家，你得到晋升的途径并不是解决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至少不是直接解决问题，相反，只要你能让其他经济学家相信你是聪明的，你就能得到晋升。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你如果要证明自己聪明，就应该提出一些炫目的崭新理论，或者找到明确的证据来证明经济的实际运行规律。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么高的创造力，至少是不能持久地创新。因此，教授最喜欢的经济学理论就是那些不需要根本性创新便可以巧妙演绎的理论。他们就玩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游戏，通常还会卖弄一些更花哨的数学符号，以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

但是，虽然教授们有时确实显得非常滑稽，但他们并不是在做无益的

学术游戏。毕竟，我刚刚对学术型经济学家进行的描述也完全适用于大学里的物理学家或医学研究者，而物理学和医学在其发展史上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近看，一切不过是人的虚荣心、卑微的企图与名利心在起作用，远看，学术都是积极而伟大的工程，能够不断更新人类的知识。

不论你相信与否，学院式的经济学也是如此。当然，今天的经济学还只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也许我们可以将它比作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医学。当时的医学研究者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人体结构与运行的知识，并能给予人们一些极其有用的防病指导，但是当时医学研究者的治病能力并不强。事实上，据医生兼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介绍，到那时为止，医学研究取得的意义最重大的结论就是，医生应该放弃一些传统的其实会危害病人的“疗法”，比如“放血疗法”，让病人自愈。

这个例子与经济学的现状并不完全吻合，但也相去不远。当前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运行机理有很深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也能提出有益的建议，例如，经济学家的建议完全可以预防恶性通货膨胀，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预防萧条。对于愿意听的人，他们也可以证明，像进口配额、物价管制这样的应对经济困难的江湖药方基本上就像医学上的“放血疗法”一样有害无益。但很多问题是经济学家不能解决的，比如，他们不知道如何让一个穷国变富，也不知道在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率似乎已经消逝的时候如何将其恢复。

对于那些想听到积极回答的政治家而言，这样的无能为力是个大麻烦。于是，一些聪明的政治家（至少是他们的下属）就开始在学术界仔细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理论来大做文章，将其转变为政治议题，进而带来选票。但政治家大都发现，他们难以在学界找到合适的理论。这是为什么呢？

通常的回答是，学者写的很多东西都比较晦涩，而且技术性强。但是，很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只要有必要，其实都很擅长写清晰的、非技术性的文章。例如，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是位著名学者，曾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很有力地论证了税收负担的不合理性，他就曾为非学术性杂志撰写过许多明白流畅的文章。又如，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高举自由主义火炬的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艾伦·布林德就曾为《商业周刊》定期写专栏，还写过一本文笔优雅的关于美国经济的入门读物。虽说很多学者写的东西都令人费解，但仍有大把经济学家既拥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又很善于阐述明晰、中肯的政策观点。

所以，政治家与教授之所以合不来，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无法交流，而是因为政治家通常希望或者需要听到特定的观点，尤其是在他们试图取代其他政治家掌权的时候，但教授们讲的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当然，有需求就会有创造，为了满足政治家的需要，一个新的群体——“政策企业家”——便应运而生了。

政策企业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开始配备一套为媒体服务的电话“提醒系统”。有了这套系统，当报纸或电视访谈节目的工作者打电话请求就某项政策问题进行采访时，他们总能在该中心找到一位具备相关知识的研究员，就算夜晚和周末也不例外。毕竟，媒体出镜率关系着该中心的生死。

如此积极地向媒体献殷勤，在这一点上，CSIS 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但在追求出镜率的动机上，它与许多其他机构并无不同。类似 CSIS 的机构至少有几十家，这些机构的成员都属于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既不是教授也不是政治家，但已经开始在思想与政策的相互影响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就是“政策企业家”。

什么叫“政策企业家”？像教授一样，他们也是职业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有学术背景，例如阿瑟·拉弗和莱斯特·瑟罗都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经济学教授职位。他们大都在华盛顿

的智库工作，或者在一些非传统的大学部门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不过，“政策企业家”最大的特征不是他们的工作地点，而是他们的言论以及他们的听众。

一位教授写的东西主要是给其他教授看的。就算是偶尔为大众写作的时候，无论他能写得多么清晰流畅，他在心底都会考虑到其他教授阅读之后的反应。这会形成一种约束，使他不能说一些听起来很悦耳但学术界都知道其并不正确的话。而且，不论他使用的语言多么简单易懂，公众通常都无法理解。

但是，“政策企业家”纯粹是为公众写作和言说的。因此，他们的写作丝毫不会受到教授那样的约束。有些问题连教授也拿不准，但“政策企业家”却能给出明确的诊断；有些问题连教授都怀疑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政策企业家”却视之为小菜一碟。

只需比较一下教授和“政策企业家”的作品的标题，二者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20世纪70年代，财政问题专家、保守派分子马丁·费尔德斯坦在一系列论文中详细说明了税收负担为何会使经济增长变慢，他的这些观点很有影响力。这些论文的标题都颇为平实，如《通货膨胀与公司利润税》等。而祖德·万尼斯基将费尔德斯坦的这些观点加以夸大，写成一本书，只有像他这样的记者出身的“政策企业家”才敢大言不惭地为该书取名为《世界运行之道》(*The Way the World Works*)。20世纪80年代，保罗·罗默写了一些有关经济增长问题的开创性论文，他取的标题颇为自谦，例如《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一个值得商榷的解释》。后来罗伯特·赖克写的一本书传达的不过是大体类似的观点，而只有像他这样的律师出身的“政策企业家”才敢自比亚当·斯密，堂而皇之地将该书取名为《国家运行论》(*The Work of Nations*)。

读者也许已经猜出来了，写大众读物的人、在电视上露面的人大都是“政策企业家”，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专职工作。而且，他们在发表言论的时